

申

SHEN

小

XIAO

龙

LONG

自

选

集

申 小 龙 著

跨

世

纪

学

人

文

存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跨世纪学人文存

申小龙

自选集

申小龙 著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跨世纪学人文存

申小龙自选集

申小龙 著

责任编辑：龙子仲

封面设计：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 张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89×1194 1/24 印张：15.25 插页：2 字数：352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633-2778-9/H·021

定价：27.00元

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元化 王铁崖 张岱年 张政烺
李学勤 陈岱孙 周一良 季羨林
费孝通

出版说明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学术所依托者,学人也。学人须由学殖养成,非纯由天资铸就。学殖者渐,天资者顿,而学术的规律是“渐”的。基于这个“渐”的规律,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以助成学术之进步。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

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受过“西风”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有过放眼望洋的蹈厉,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他们在80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90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倘不能对自身的存在作出健全、合理的解释与肯定,那便是崩溃的开始。学人的使命,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可堪忧心的问题。

《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国这一批新学人,多是这样的“心忧”之人,当其激切之初,曾蹈厉

于良知的煎迫；当其冷静之余，又沉潜于学理的涵泳。这样的“心忧”，是学界的好传统，也是中国学人最可宝贵的品质。他们的学术自选集，也许不一定能呈示其学术全貌，但肯定能够突出体现其宝贵的学术品质。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希望这样的品质能够在 21 世纪的中国学人身上传承下去。

“跨世纪”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并不是说未被列入“跨世纪”的人就无权迈进下世纪的门槛。“跨世纪”只是意味着，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昌明与辉煌有着多么热切的期许，以及基于这热切期许而履行的对中国文化建设重任的自觉的肩负。没有这样的自觉，便没有迎接新世纪的真正准备，也就没有了开创未来的现实基础。丛书收入的，都是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著述，我们想：人类存在的价值，其终极尤须以人文的尺度来衡估。

90 年代的沉潜，也许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已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这样的转型是承前，也是启后。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我们出版这套“跨世纪学人文存”，旨在尽我们的薄力，倡学术之昌明。

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九七年九月

自序

自我1982年大学毕业发表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本科毕业论文《论深层结构》以来,弹指15年过去。在这15年中,我由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到成为复旦大学教授,可以说始终处在当代中国语言学的“风口浪尖”上。国内外众多的语言学者,用汉、英、德、日等多种语言,对我提出的文化语言学进行了广泛的评论和激烈的论争,其中我见到的论文已有百余篇。有关文化语言学的全国性研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已举行了五届。海内外的一些刊物还辟出专栏来讨论我的观点。欧洲和日本一些大学的汉学研究者,或以“中国文化语言学”作为他们的博士论文题目,或翻译我的著作。国内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外语学者,亦联合选译了我的几十篇论文结集出版。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对我的理论的课堂讨论,多次用英文发表在外语刊物上。为什么文化语言学引起语言学界这样强烈、持久的反响?近日我读到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语言学系Edward McDonald博士的长篇系列论文《“中国文化语言学”运动和汉语的本质:中国国情的新表现?》(The “Chinese Cultural Linguistics” Movement and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 new manifestation of guoqing?)、《申小龙语法理论在系统功能框架里的解释》(A Reinterpretation of Shen Xiaolong’s Grammatical Theory in a Systemic-functional Framework)等。作者认为:“在语言学界,中国学术传统与引进的西方思想之间的对立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加鲜明。自19世

纪后期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人们就反复争论这样一个问题:西方理论是否适合汉语的描写?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场名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新运动。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一群青年学者,其代表人物是复旦大学的申小龙。申氏提出了许多关于汉语本质的激进的新观点,号召全面摒弃目前语言学界使用的,在西方思想启发下建立的理论模式。……申小龙在年轻学者中的广泛影响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即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意识,以及中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与西方的关系这一古老而现实的问题。”Edward McDonald 还指出:“名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知识运动出现于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热潮之中。它重现了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问题。中国文化语言学对汉语所持的态度表达了一种许多人认为处于中国文化核心地位的观念。这场运动之所以值得人们思考,是因为它不仅重新探讨了汉语学术研究中的一些老问题,而且有着独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动机。”正因为如此,Edward McDonald 要以系列论文“集中讨论中国文化语言学最突出的实践者,也是这一概念实际上的创造者,上海复旦大学的青年(按中国标准)语言学学者申小龙。他的著作既有着最突出的个人特征,又最典型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整体特点。”为此,他采用了 Geremie Barme 和 Linda Jaivin 1992 年主编的中国当代思想文集《New Ghosts. Old Dreams; Chinese Rebel Voices》中的研究方法,即“从大量的材料中选择或摘录一部分并编排在一起,以说明普遍关注的问题或矛盾和争议的焦点”。

例如,他为了对比美国语言学的生成语法“乔姆斯基革命”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革命”,将美国学者 Frederick J. Newmeyer 1980 年出版的《Linguistic Theory in America: the first quarter century of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一书中所引结构主义语言学者 Charles F. Hockett 的一段话和我 1989 年在《书林》杂志上的一段引言编排在一起:

“我知道自己以前可能会对‘新语法学派’的毫不客气的风格)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对罗伯特·李(Robert B. Lee)评论乔

姆斯基《句法结构》时用的类似语气是如何反应的。我们并不愿意被别人告知自己是傻瓜。对宗教狂热主义者强加的咒语,我们可以轻松地耸一耸肩,因为我们早就知道这些人总是确信他们手里掌握着通向天堂之门的唯一钥匙。可是如果一位受尊敬的同事揶揄我们深信的观点,那么我们总会私下里想他也许是正确的。”

(Hockett, 1965, “Sound Change”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LSA, 1964], *Language* 41. 1. pp187)

“这些年与我共风雨的年轻人又向我发出了警告。他们在对我的《中国语言的结构与文化精神》一书所写书评中指出:‘他的论文,不是个别概念、定律的变换,而是整个语言世界形象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工作是为了引出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他正在提出种种中国语言学的新的范式。……他的警告没有白费力气,在承认危机这一前提下,中国语言学的中青年阶层,已经隐隐躁动着改革的潜流。……客观地说,申小龙已是这股潮流的旗帜人物。不过,如果这种改革是以新的一元化取代旧的一元化,那恐怕不是最好的结果。较为理想的是使中国语言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所以我们不敢也不愿说申小龙的方向是中国语言学唯一正确的方向。’”

(申小龙, 1989, 《走出麻木与悲凉》, 《书林》1989. 2, pp. 17. 文中引文出自北京大学王刚《龙年的奉献》, 《语言文字学》1990. 6)

Edward McDonald 认为,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著作中提出了“科学的”和科学学科的概念为乔姆斯基和申小龙的革命提供了他们所需的意识形态依据。库恩认为,作为科学实践的发展,“科学革命”的特点在于“一种旧的范式完全或部分地被一个崭新的范式所取代”,以应付现有系统中“日益扩大的危机状态”。(Thomas Kuhn,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乔氏语言学和中国文化语言学也被各自的拥护者说成是库恩范式转换的典型范例。而且,乔氏和申氏都鼓吹“科学的”这一术语的力量。不过,他们像是用同一术语表达截然相反的事物。对乔姆斯基来说,“科学的”意味着数学上的精确化和形式化,申小龙则认为这是“科学主义”的错误,他明确反对将汉语描写精确化和形式化。在他看来,“科学的”意味着“认同于语言的精神”! 更

进一步说,乔氏语言学和中国文化语言学打着创新的旗号,实际上却极为保守:一方面是乔姆斯基对语言分析技巧进行伪数学的改造,并试图在18世纪法国唯理主义语言学保尔——罗瓦雅尔学派的著作中“寻找经典论据”(Claude Hagege, 1981,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Generative Grammar*, Lake Bluff, Ill., Jupiter Press, pp. 8)一方面则是申小龙反对将数学公式的方法用于汉语语言学,力图在中国复活传统的语法理论。这两者有近乎对立的一致。正如申小龙和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有关汉语本质的观点基本对应一样,申小龙与乔姆斯基在中国和西方知识界都同样求助于两大有威力的话语:科学和传统。而且,在建立新范式的斗争中,申、乔二人都完全忽视了这两种话语鲜明的对立性质。

我想,Edward McDonald的评论虽然很有逻辑张力,但他显然过于概括了。“科学”作为一种话语,自从出现“人文科学”这个概念后,它的“权威”正在不断地被消解。在我和乔姆斯基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共有的有威力的科学话语系统。而“传统”,对于乔姆斯基,不过是在他的认知假设和理论建构之后的经典追认,或曰意义的回授。他“寻找”的其实不是“传统”,而是“论据”。而“传统”于我,则是我所依存的整个民族文化底蕴,是血液和生命,是贯注我全部汉语研究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关怀。这种认同与关怀,在McDonald看来蕴含着“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渊源”和“爱国主义动机”,亟待“清理”。而我以为这种“清理”的本身就反映着文化偏见和话语权威,在它起步的时候就已经“向后转”。不同文化的语篇差异乃至话语冲突,不是“清理”能加以消解的,人类已经找到比这种陈旧方式更好的方法,那就是理解。

当然,我还是感谢这位McDonald。他和他的澳洲同事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是“试图将申小龙有关汉语的许多有益洞见结合进一种语言学理论之中,这种语言学既不是枯燥的、缺乏理论概括的形式分析,也不是玄而又玄的‘文化认同’,而是力图用具体而系统的方法,根据一种语言本身的特点来描写它,并将这种语言与语言使用的社会以及文化环境结合起来”。在McDonald的新作《跨文化学术传统:汉语语法的中、英文描写》中,他把他和他的同事所进行的这一工作更进一步称为“给现有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二范式之间的冲突,引进另一种范式冲突,即系统功能理论的‘(社会符号性)功能主义’与其他范式之间的

冲突”。所谓“文化主义”在他看来是“文化决定主义”，所谓“结构主义”，在他看来是“密封形式主义”（语言的内部组织与语言外无直接关系），有趣的是 McDonald 将“文化主义”与“西方人文科学传统”作了某种联系，并将这种联系与某种地域文化背景贯通起来。他说：

“我们认为，申小龙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尽管较为极端，可是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中国语法学家 30 年以来几乎忽略的一个大问题，即现有的西方理论描写框架在什么程度上适合于汉语的语法组织。……就这个问题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语言学运动当中的不少支持者是上海人，上海是最大量的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城市之一，申小龙作为上海人则很熟悉他称之为‘西方人文科学传统’的维柯、洪堡特、萨丕尔、沃尔夫等学者的著作。申氏也可能正因此比中国语言学家的老前辈更为敏感‘洋框框’的困境。换句话说，他看到了与结构主义传统不同的其他西方语言学传统。”

事实上，在我看来，人类的“语言人文主义”有三大传统。一是欧洲语言人文主义，其特点是哲学的思辨；二是中国语言人文主义，其特点是经学的阐释；三是美洲语言人文主义，其特点是人类学的实践。这三大传统体现了人类对语言与人性、乃至世界的本质联系的永恒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语言学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一种现代理解。当然，这种理解为了看清某一点“点”而不得不把另一只眼睛闭起来，因而产生“偏见”。但我以为，对于任何一个正在走向新世纪的学者来说，“逻辑彻底，学派兼容”都应该是他学术人格的完整体现。Edward McDonald 预言：“不幸的是，今天的‘青年革命者’变为明天的‘老卫道士’是一种历史趋向。就像 50 年代的美国结构主义一样，当代中国语言学也存在着走极端的问题。说二者都潜伏着‘危机’，我想一点也不过分。此外，语言学组织结构的僵化也可能引起某种极端的革命。正如乔姆斯基对美国结构主义传统的反动一样，偏激的矫枉可能导致一种独裁取代另一种独裁。我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乔氏语言学身上。”——我想，这一预言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不会成为现实。

感谢我的母校上海铁路职工子弟第二小学、上海杨浦中学、复旦大

学的老师们,感谢我的亲人外婆盛蔓竹、父亲申二伽、母亲胡蕴青的养育之恩,感谢我的妻子韩杨、儿子申逸如给予我的爱和支持。这是我在编完这本自选集之际首先想到的。

是为序。

1996年春节于复旦大学

目 录

自序····· (1)

理论语言学

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 (1)

语言的人性与人的语言性····· (27)

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语言观····· (43)

从语言之气到哲学之气····· (57)

语法学

中国语言的文化形态····· (67)

汉语语言类型的新探索····· (84)

中国语文研究的词类学传统····· (98)

中国语文研究的句法学传统····· (111)

训诂学

训诂:中国文化阐释的前沿····· (124)

论中国古代词源学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134)

宋代语言学的汉学批判与其历史性超越····· (151)

音韵学

清代古音学系统论····· (176)

汉语音韵的人文理据及其诗性价值…………… (188)

文字学

汉字形义思维说…………… (201)
汉字构形的主体思维及其人文精神…………… (225)
《说文解字》系统论…………… (237)

修辞学

中西古典修辞学传统比较…………… (255)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之语境通观…………… (264)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之阅读方略…………… (274)

西方语言学

美洲语言人文主义及其研究范型…………… (289)
古典洪堡特主义与当代新洪堡特主义…………… (303)
系统演变的功能主义解释…………… (315)
论结构人类学的语言逻辑…………… (324)

主要著述一览表…………… (347)

CATALOGUE

The Author's Preface (1)

•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

Cultural Gap and the Changes of Chinese Modern Linguistics
..... (1)

The Human Nature of Language and the Linguistic Nature of
Human (27)

On the Humanistic View of Language in Ancient China (43)

From Linguistic Qi to Philosophic Qi (57)

• Grammar •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Form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67)

A New Approach to the Type of Chinese Language (84)

On the Research Tradition of Word Class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logy (98)

On the Research Tradition of Syntax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logy (111)

• Gloss •

Gloss; the Forward Posi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124)

Studies in the Unity of Logic and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tymology (134)

Philology of Song Dynasty; It's Historic Transcendence with

Critique of the Han School	(151)
• Phonology •	
Studies in the Systems of Qing Dynasty's Phonology	(176)
The Humanistic Background and Poetic Value of Chinese Phone	(188)
• Graphonomy •	
Researches on the Mode of Thinking in the Conformation and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201)
Chinese Characters' Conformation: Its Subjective Thinking and Humanistic Spirit	(225)
Studies in the Systems of SHUO WEN JIE ZI	(237)
• Rhetoric •	
Contrast between the Chinese Classical Rhetoric and the Western Classical Rhetoric	(255)
On the Overall View of Context in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Rhetoric	(264)
On the Reading Strategy in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Rhetoric	(274)
• The Western Linguistics •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Linguistic-humanism with Its Re- search Model	(289)
The Classical Humboldt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New-Hum- boldtism	(303)
The Func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System	(315)
On language logic of structure anthropology	(324)
The schedule of main works	(347)

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

一个民族的维系有种种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该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而作为这种认同的主要表征,则是民族语言。语言科学是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带头科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指导思想的经学几乎包括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部内容。而经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正是语言文字的考证和训释。当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危机的时候,首当其冲的也是阐释封建文化之“道”的利“器”——传统小学。在除旧布新、新旧纠缠的文化震荡之中,从传统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文化断层也在历史地形成。这一断层在初具规模的30年代曾引起语言学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研讨。而在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潮水般涌入,著述蜂起之时,这一断裂立刻被义无反顾地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新层面。在它上面迅速搭起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恢宏的脚手架。由此产生的新的历史惯性竟使人们在半个世纪中汲汲于圆说西方语言理论概念体系,直至将汉语分析的一个个基本领域逼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以至于叹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之时,仍无意对脚下的文化断层作出已经过迟的反省。直到7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现代化的进层,中国文化在与世界其他工业文明的文化的比较、冲突、交融中重新得到评价和检讨,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汇的建树及其酸果才有了一个重新认识和“回甘”的机会。汉语语言学界正在意识到,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一样,要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根